

联合国人才发展战略的新特点

□ 刘 洋

务机构改革，将可以通过远程共享服务的业务逐步整合为全球一个或几个具体服务的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工资发放、人力资源、财务、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减少国别办公室层面的人力资源成本和采购成本，将其可以通过远程共享服务完成的业务集中在一个具体部门完成，节约成本的同时提升了工作效率。

三是数字战略背景下联合国系统更加青睐经济类专业人员。联合国数字化战略转型急需数字化的经济型人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类分析师、财务官员、采购人员的需求加大。例如，世界银行招募具有国际职业资格认证的高级财务官以及5年期合同的青年经济分析师；亚洲开发银行招募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初级专业人员开展私营部门合作。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的国别办公室层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于项目的具体执行造成较大影响，为完成国别办公室的年度预算项目交付，国别办公室层面对有经验的懂信息化手段的财务和采购人员的需求逐步加大。

四是环境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仍然紧缺。环境问题和公共卫生带来的挑战，使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对项目的技术专家需求加大，世界卫生组织急需招募流行病预警和应对、基础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和监督、健康政策、项目管理、实验室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官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急需招募的岗位为国际生态系统管理、能源专家、电动汽车高级专家、法律官员、项目管理、财务预算官员等。

五是联合国系统人才使用方式更加灵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联合国所属组织如开发计划署自2021年1月开始，与固定期限员工合同的签署由每年一签改为两年一签，这不仅有利于留住人才，更是在危机情况下对人才的一种保护和权益保障。另外，联合国系统的短期合同类型如个人合同或服务合同的数量将不断增加，通过采购的方式招聘项目执行中短期需要的技术专家等也体现了人才使用的灵活性。

六是联合国系统人才开发逐步向基层倾斜。除联合国系统的总部和区域中心外，更多的国别办公室等基层组织在帮助贫穷国家减贫、抵御自然灾害、保护环境、促进公平等方面从技术援助、政策支持等角度力求帮助所在国达成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这需要具有宏观战略思维并掌握技术的高级官员在国别办公室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因此，联合国系统不少新任高级官员大部分都在艰苦地区历练过，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此外，从青年人才的培养角度也不难看出，当前开展的初级专业人员项目已充分体现了向基层区域倾斜的特点。例如，2020年秋季，德国向亚洲开发银行推送投资专家，从事亚洲开发银行具体国别办公室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运营。

七是对全球传播通信人才加大招募力度。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招募全球传播通信人才，旨在通过传播联合国及其机构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其他议程方面所作的贡献和所采取的行动，宣传联合国价值观和理念，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树立联合国更好的形象。全球传播通信人才需要了解联合国系统的组织文化，并能够与当地新闻媒体更好地沟通协调，做好各类具体活动和项目的组织、沟通、联络、传播通信工作。

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优势。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形成各级党委统一决策、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强大合力，才能具备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勇气，才能具备敢打敢拼的恒心和毅力，才能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组织保证。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基层是基础，基层党组织能否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直接关系脱贫攻坚的成效。我们党始终强调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作风保证。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重在队伍作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以优良作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把监督执纪挺在前面，大力治理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各级干部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好扶贫这件大事。坚持发挥我们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开发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增进人民福祉，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面对事关党的事业全局的大事，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举全国之力强化扶贫资金整合，强化扶贫政策协同，强化扶贫力量聚合，强化脱贫成效考核，高质量完成了扶贫资源跨区域、跨部门的有序调配，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得以深化，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坚持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脱贫攻坚过程中，强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

□ 熊北辰

国际金融组织是由多国共同建立的从事国际金融合作、承担全球金融治理功能的国际组织，是全球金融治理中实施选择性激励的基本制度安排。国际金融组织的良好治理，有助于实现各国有序汇兑安排，稳定各国货币平价，开发生产性资源，统一国际金融标准，为国际贸易投资多边化、国际资本自序流动创造条件，促进各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有机融合，打造更为健康积极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国际金融组织依照其成员分布情况分为区域性和全球性两种。根据其所承担的主要治理内容，又可以主要分为三类：货币合作与政策协调类、规则制定类、发展融资类。不同类别的国际金融组织分别承担不同的金融治理职能，呈现出不同的治理特点。

货币合作与政策协调类

该类组织主要承担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协调汇兑安排、协助建立多边支付体系、帮助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职能。代表性组织主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东加勒比中央银行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货币合作与政策协调的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成立于1945年，发挥着推动国际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贸易规模扩大和稳定发展、调控汇率波动幅度、促进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和多边支付体系建设、从资金角度对成员国进行暂时性援助、遏制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状态等重要职能。截至2016年，其成员国已达190个国家，基金总份额达6680亿美元。经过多年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协助国际汇率调控、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之一。例如，世界各国的外汇管制，会对国际贸易的展开产生障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帮助各国建立多边支付制度等种种方式，在各国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尽最大能力为世界贸易清除障碍。但世界经济环境与政局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暴露了一些问题。由于主导权大多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分布、表决机制、执董会席位分配、工作人员结构、问责机制等治理要素并未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建立起动态调整机制，监督与援助往往也不够及时高效，导致基金组织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影响。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是2010年6月由欧元区成员国为了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共同创立的救援机构。基金设立后，以发放贷款给遭遇融资障碍的国家这一形式，干预债券一级和二级市场，实施预防方案，通过向政府

提供贷款以支持金融机构的资本重组等措施，阻止了危机蔓延，维持了欧洲金融稳定。

规则制定类

该类国际金融组织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并实施国际金融标准和监管规则，更新并推行最优的风险管理框架，提前对全球金融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作出预警并采取防范措施，针对不同负面状况进行治理。代表性组织主要有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等。

国际清算银行的前身是针对德国在一战战败后对各国的赔款进行清算的专门机构，于1930年设立，之后则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联合组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成立年份最为久远，也是目前各主要中央银行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平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并称为三大核心国际金融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从为各国提供国际金融交易服务开始，随着国际金融发展而逐步将职能扩展到为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支持，以及部分承担了评估全球金融系统脆弱性、监督各国对不稳定因素进行改进、开展危机早期预警等职能，大量参与了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与执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通过加入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要标准制定机构及其上级治理机构，积极参与危机后国际金融标准与准则的制定，主动地加入到国际金融监管工作当中，并深入地参与了各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体系流动性与资本性强化、管理框架的宏观审慎等金融监管的相关工作当中。不仅如此，中国还充分地国际清算银行所发挥的平台效应利用起来，极大地程度地增加了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进行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交流，使自身与其他国家合作更为紧密。

金融稳定理事会是自1997年七国集团所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发展而来，顾名思义，其原本作用是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自新世纪以来，全球金融与经济发展当中新兴市场国家作用日益明显，因此在2009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正式将金融稳定论坛更名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并将成员团体扩大至G20所有成员国，中国也被囊括在内。金融稳定理事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和各国金融管理政治部门间进行协调，促成符合经济环境的国际标准政策的设立，并推进其落实，以达到维持国际金融稳定发展的目的。

发展融资类

发展融资类国际金融组织在防止灾害、推进生产性资源开发、促进全球和区域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类组织根据覆盖广度可分为区域性与全球性。例

如，世界银行集团就属于全球性组织，而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属于区域性组织。

世界银行集团直属于联合国，于1944年成立，主要从事对国际金融业务的经营，同时也会提供技术与金融方面的支持，以扶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银行集团由五个机构共同构成，机构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合作。五个机构分别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五大机构分工明确，其中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被合称作世界银行，分别向经济贫困的国家施以赠款与无息贷款，以及为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或收入水平较低但信用良好的国家提供贷款。而其他三个机构则作为世界银行工作的辅助者，由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在成员国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进行协调，帮助成员国吸引外资并为其提供政治风险担保；由国际金融公司提供隶属于成员国的私人企业无政府担保贷款；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则在发生投资争端时发挥调解与仲裁作用。世界银行在1947年开始投入运行之后，至2015年共实施服务项目12215个，173个国家和地区享受了世界银行的经济支持和金融支持。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对原有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银行的局限性日益显现，贷款供需不平衡、债务问题突出、政治化影响严重、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等诸多问题更加突出，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已愈发满足不了新形势的需求，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呼吁其作出改革的浪潮。

基于原有世界秩序的诸多金融组织已不能承担全球治理重任，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架构，于是许多国家开始尝试组建其他的金融组织，以适应新的变化。比如，金砖国家为了发展本国货币经济，防止欧元、美元过度干扰本国发展，共同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了拉丁美洲储备基金组织，等等。2015年，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地区建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主要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推动亚洲地区经济与全球经济同步协调发展。亚投行的投资项目涉猎广泛，城市建设、交通、电信、能源等领域均有参与，投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亚投行等新兴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当中起到了重要的协助治理作用，对全球金融治理形成有序环境意义重大。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积极因素。着力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贫困群众的心热起来、手动起来，引导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双手创造美好生活，从“要我富”到“我要富”，把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志气鼓起来。贫困群众有了信心与干劲，有了积极性，才能真正实现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脱贫的成果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着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我们党始终把脱贫攻坚的重点放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上，强调着力补齐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发展后劲。通过先进典型宣传、榜样示范引导和完善正向激励等机制，激发贫困人口参与意识和创造性，逐渐推动贫困人口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转变。通过精准开展面对用工岗位的系列就业技术培训，使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贫困人口走上稳定脱贫之路。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全面深化扶贫领域改革、构建扶贫治理体系的高度提出的对扶贫工作新论断，对扶贫理论新发展，其核心是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及解决“四个问题”。做到“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求，要通过强化“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户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实现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实施“五个一批”，是分类施策的工作思路 and 实现途径。要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为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开出破题良方，旨在将“大水漫灌”式扶贫转变为“精准滴灌”式扶贫。解决“四个问题”，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本质要求，通过贫困识别建档立卡，解决“扶持

谁”的问题；通过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解决“谁来扶”的问题；通过因村因户因人分类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通过明确贫困退出标准程序和检查办法，严格规范贫困退出，解决“如何退”的问题。“四个问题”的破解，让脱贫决策更合理、扶贫施策更精准、脱贫成效更巩固。

坚持处理好四个重要关系。打赢脱贫攻坚战总会碰到一些困难和阻碍，需要适时调整和完善，并妥善处理好四个重要关系。妥善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依托深化改革，以顶层设计为引领，不断创新脱贫攻坚的方式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基层300多万名扶贫干部推进脱贫攻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做出了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实绩。妥善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的精准发力，建立健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良性互动机制，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式的社会参与贫困治理机制。妥善处理好国内和国际的关系。中国减贫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扶贫特别是脱贫攻坚立足国内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充分发挥了重要软实力作用，同时面向国际，把中国减贫放在全球减贫发展中谋划和推动，总结了经验，讲好了中国脱贫故事，为全球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妥善处理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内容具有交织性、旨在实现共同富裕，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上接1版）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300多万人，整体上提前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巨大成就，有力地加速了全球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乃至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南非人类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员亚兹妮·艾波尔指出：“中国精准扶贫的艺术。在减贫实践和经验方面，中国是全球无可争议的冠军。中国在减贫与改善民生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源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对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脱贫攻坚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们积极探索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责任明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减贫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等，为国际贫困治理理论创新提供了借鉴，对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进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治理贫困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在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宝贵启示。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脱贫攻坚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力量持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定盘星”作用进一步彰显。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效，充分展现了我们党